

安特生笔下的中西关系

· 李雪涛 ·



安特生(左二)在仰韶村首次发掘时的留影



安特生在他创建的东方博物馆内(1927年)

“龙”是中华文化的精神象征；“洋鬼子”既是指安特生自己，也指一般的西方人。因此，书名的含义就是“中国与西方”。

在中国，尽管儒释道三教间也存在着不少的竞争和冲突，但最终它们能够实现共存和互补。与排他性的基督教相比较，安特生在他的书中盛赞中国文化的宽容性：

自最早的传统出现伊始，中国对各种宗教的包容度便极强，这使得受过教育的现代中国人在得知西方兴起的野蛮的十字军东征、宗教战争、异端审判、现代的异教排斥，甚至是各种派别的基督宗教等时讶异不已。

在安特生看来，中国并非西方人所认为的“一个毫无法度的异教徒国度”。安特生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讲，传授教义和信条是毫无价值的，“真正吸引他们、赢得他们尊敬、关怀和友谊的，是以身作则”。而自鸦片战争以来那些西方的基督教信徒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实在无法让中国人信服，进而相信

这种上帝的宗教：

从1890年起的十年间，自诩为先进文明的西方列强，几乎都沉迷于强迫中国割地赔款，甚至提出无理要求，企图瓜分中国，划出各自的“势力范围”。这一切，如何让尴尬的“文明使者”粉饰侵略、美化暴行？

抨击“白祸”

安特生在书中特别抨击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罪恶图谋，他在《白祸》一章中写道：

1896年沙俄以三国干涉还辽有功，诱迫清政府签署《中俄密约》，将东三省的铁路修筑和经营权交给俄国、并同意战时开放使用港口……对中国人来讲难道不是一种“白祸”吗？

安特生非常辩证地看待西方和中国的关系，一方面他强烈谴责西方对中国的殖民和奴役的心态，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在中国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演进发展过程中，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意义所在。安特生认为，废除列强在中国的治

外法权，是保证中国司法独立的重要步骤。他指出：

中国现在的司法体系专横武断、尚不健全，政局也不稳定，所以目前不能像他国那样给外国人提供可靠的法律保护。要根据中国司法效率提高的进程，分步骤、分阶段地废除治外法权。根本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中方保持克制，需要外方的善意。

19世纪以来，中国并非唯一授予外国侨民治外法权的国度，当时在亚洲的日本、泰国、伊朗、土耳其，在非洲的埃及、摩洛哥等所谓“未开化”国家，西方都曾采取强压的方法保护西方侨民单方面的治外法权。

其实早在1917年，中国因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与德国和奥匈帝国为敌，从而废除了这两个国家侨民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安特生也提醒中国，如果想要根本解决这一问题，又不妨碍中国自身发展的话，“需要中方保持克制，需要外方的善意”。其实最根本的还是中国自身的经济、社会的发展。

中国和瑞典的共同历史

由于瑞典没有参加近代以来侵略中国、瓜分中国的各种帝国主义活动，1912年民国建立以后，中国政府保持着与瑞典王国的友好关系。安特生之所以同情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遭遇，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同样遭受列强欺凌的历史：

瑞典人反抗外国入侵的历史长达五百多年，这不由得让人联想起当今中国人反抗外国人的斗争……瑞典最早的货币铸造，就是模仿外国的图案；瑞典早期也有从国外来的大量传教士，他们的目的是在瑞典传播基督教，这两点与当今中国的情况有明显的相似。

在安特生看来，作为北欧小国的瑞典周围有诸如俄国、法国和德国这样的大国觊觎，其在历史上的境况跟中国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在《龙与洋鬼子》一书中，他常常以自己的祖国为例，解释中国自19世纪中叶以来被西方列强所瓜分、奴役的历史。

在中国生活了11年之久的安特生，不再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孤立地来看待了，在《龙与洋鬼子》中，他总是将研究对象置于广阔的中西相互关系情境中来理解和考察，从而跳出了当时依然很流行的西方中心论思想。安特生的这部书将自己置于当时中国的位置，并由此来理解中国人在遭遇列强的瓜分和压迫时的感受，这是一种站在中国人的角度“将心比心”的做法。

1937年，安特生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再一次来到他魂牵梦绕的中国，希望继续之前他开创的史前考古学的事业。当时正值战争期间，并且他的好友丁文江早在1936年初就去世了。安特生只好于1938年转道回到了瑞典，那年他已经64岁了，至此再也没有回到中国。1960年10月29日，安特生在斯德哥尔摩病逝，享年86岁。

（摘自5月4日《中华读书报》）

三国乱世的真实谍战

· 成长 ·

近日，由马伯庸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风起陇西》正在热播，剧中魏蜀两国展开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谍报暗战。三国是天下纷争、奇谋迭现、的大时代，也是谍战的“黄金时代”。从史书《三国志》中，我们能窥见三国历史上真实谍战的血雨腥风。

曹魏间谍卧底东吴

三国历史中最为传奇的间谍，莫过魏谍隐蕃。

230年，正是魏蜀吴三足鼎立之时，年仅22岁的青州人隐蕃从曹魏南下归吴，成为吴主孙权的座上宾。隐蕃口才很好，谈及天下形势头头是道，孙权对他很欣赏，让隐蕃担任了廷尉监。

实际上，隐蕃的真实身份是魏明帝曹叡派往东吴卧底的间谍，他的任务就是在吴国担任高官，离间大臣之间的关系。“隐蕃”这个名字甚至都可能是一个化名，寓意“隐藏于藩国”。

隐蕃担任廷尉监后，迅速展开了活动，在东吴广泛交结各类名士，编织关系网。比如，隐蕃将笼络的对象集中在东吴政坛比较边缘的蜀汉降臣身

上，他的上司廷尉郝普就与他来往密切，盛赞他有“王佐之才”。太常潘濬之子潘翥不仅与他交好，还经常馈赠他金钱。此外，孙权的女婿左将军朱据、卫将军全琮都与他“倾心敬待”。

然而仅仅一年的时间，隐蕃就暴露了。暴露的原因是东吴对曹魏实施了情报战，派中郎将孙布诈降，诱引魏将王淩，并设下包围圈准备伏击魏军。隐蕃为了向王淩示警，提前行动，但事机泄露被捕。王淩察觉异常，及时退兵，避免了一场惨败。隐蕃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拯救了魏军。

隐蕃被捕后，面对酷刑不为所屈。孙权亲自提审他，要他供出同伙，隐蕃却说，“孙君，丈夫图事，岂有无伴？烈士死，不足相牵耳”，之后从容赴死。隐蕃至死也没有供出同伙，堪称一名忠诚的谍报人员。

蜀汉刺杀案

三国时期，由于战争频仍，刺客往往与间谍合二为一，以

潜伏渗透的方式进入敌营，伺机刺杀。

蜀汉延熙十六年(253)正月初一，执掌蜀汉军政大权的大将军费祎正在举办岁首大会，大摆筵席。酒过三巡，费祎迷迷糊糊之中，他看见左将军郭循(一作郭脩)走近前来。费祎正欲端起酒杯与他对饮，不料郭循突然面露杀机，手执一把匕首，径直刺向费祎胸口。费祎当即丧命，郭循也被赶来的卫兵所杀，这就是蜀汉政坛神秘莫测的费祎遇刺案。

刺客郭循原是曹魏西平的一员将领，姜维攻打西平，将他俘虏，他就顺势归降了蜀汉，并且一路做到了左将军。但实际上，郭循是曹魏派来潜伏在蜀汉的间谍。

郭循最初的目标是想刺杀蜀后主刘禅，但他发现刘禅很难接近，刺杀难度太高，于是更换了目标，刺杀了当时蜀汉的实际主政者、诸葛亮临终钦定的“接班人”费祎。郭循死后，曹魏方面追谥他为威侯，重赏其家人。

从表面上看，郭循行刺的幕后主使似乎就是曹魏，但其动机匪夷所思。因为当时，蜀汉内部正在围绕是否北伐进行激烈的争论。姜维是主战派，他一心想效仿诸葛亮，重启北伐。而费祎是主和派，他认为北伐只会徒劳无功，不如保境安民。每次姜维出兵，费祎就在后方“裁制不从”，将姜维的兵力限制在仅有万人。费祎一死，姜维没有掣肘，立即发动了对曹魏的大规模进攻。郭循的刺杀行为如果是曹魏指使，岂不是搬石砸脚？

因此，这场由曹魏叛将所引发的刺杀案就变得迷雾重重，有人猜测是姜维利用他杀死费祎，除掉政敌，还有人猜测是刘禅在幕后主导了这场戏，意在防止出现权臣专政的局面。

文字笔迹里的情报战

谍战剧中的许多情报都是通过文字密语来传递的，而在三国时期，人们已经熟练地从文字笔迹中破解谜团，通过

文字笔迹来展开情报战。

曹操手下有一个学识渊博的人叫国渊，曹操让他担任魏郡太守。当时曹操刚统治河北，有一些反对势力写了篇文章诽谤朝政，在社会中广为流传，影响很坏。但因为文章是匿名，查不到源头，曹操便委派国渊处理此事。

国渊拿到这篇文章仔细分析，发现作者在行文中经常引用东汉文学家张衡所作的《二京赋》，于是心生一计。他找来三个情报人员假扮学子，让他们去城内拜师求学，尤其是寻找精通《二京赋》的人求教。

不久，这三个人果然找到了能教《二京赋》的老师，并且按照国渊的要求，带回来老师的书信作为学习的凭证。国渊将几封书信和诽谤文章比对，发现其中一人的字迹和诽谤文章如出一辙，于是立即将那人抓来审问，果然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

此外，大书法家钟繇之子钟会，还曾经凭借自己高超的书法造诣，模仿敌将亲属的笔迹撰写劝降书，成功策反敌将，为司马昭平定淮南叛乱立了大功。（摘自5月10日《中国青年报》）